

2011 年第 4 期
(总第 148 期)

南 洋 问 题 研 究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No. 4 2011
General Serial No. 148

东西方文明对话语境下的越南

——野平宗弘《新意识——越南流亡思想家范公善》述评

吴光辉 吕灵芝

(厦门大学 外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6)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56(2011)04-0099-04

解读西方乃是东方国家始终不变的现代性主题,也是西方现代性向整个世界拓展的历史背景下赋予非西方民族不得不面对的一大主题。就在这样的冲击与解读的循环往复之中,西方民族的话语以一个现代性的霸权的形式不断地冲击着旧有的文明体系,旧有的文明体也不得不发生自我裂变,或者是颠覆自身文化传统,将自己编入到欧洲普遍主义的“文明”历史之中;或者是采取着演绎的方式,回归自身传统,走向与西方的对决。^[1]

作为西方的反面,东方或者说东亚的诠释活动一直以来皆受到极大的关注。在此所谓的东亚,一直以来是日、韩、中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但是,它们是否可以代表东亚乃至整个亚洲,或者说与西方处于对立的东方?不言而喻,即便是东亚内部,应该说亦存在着极为丰富而复杂的多样性。本文所尝试介绍的,则是日本学者野平宗弘博士著述的、荣获 2010 年度日本东南亚史学会奖的研究著作《新意识——越南流亡思想家范公善》。^①本文希望通过对该书的介绍与诠释,来提示日本学者从事越南研究,乃至东南亚研究之际所展现出来的新视角、新方法、新意识。

一、“新意识”的缘起

中国人记忆下的越南,应该说体现为一连串战争的记忆。19 世纪末期的中法之战、日本占领东南亚的二战、越南反对法国殖民地的战争、越南与美国的越南战争、越南与柬埔寨的战争、中国与越南的战争,就是这样一系列战争所铺垫下来的越南想象。不过,或许我们由此可以梳理出一个宏

收稿日期:2011-07-27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10221084)阶段性研究成果;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0640-D05016)

作者简介:吴光辉,男,湖北武汉人,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吕灵芝,女,广东韶关人,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研究生。

① 该书全名为《新しい意識—ベトナムの亡命思想家ファム・コン・ティエン》(日本岩波书店,2009 年 5 月)。

大的叙事背景,即越南也在解读西方的过程中不断地经受着挫折与误读,走过了一条自我道路的探索。“新意识”的缘起,我认为首先应该归结为越南抵抗西方文化的独特解读。

不仅如此,我们必须指出一点,即东亚内部的多样性使他们各自解读西方的诠释活动也呈现出了多样性的特征。日本学者高坂史朗曾经概述日·韩·朝·中的近代化模式,并突出了日本的“和魂洋才”、朝鲜·韩国的“东道西器”、中国的“中体西用”等一系列的关键话语。^[2]这样的模式大多是采取以自身传统文化为主,以西方现代文明为辅,由此来构建自身现代性的一个结构。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即东亚内部各个不同的文化地域也决定着他们彼此文明模式的异质性。与“大陆文明”的中国、“半岛文明”的朝鲜、“海洋文明”的日本不同,作为狭长之地的近代越南经历了多个不同时期、不同政权的变迁,呈现出一个“海岸文明”的格局。换言之,东亚社会尽管历史上存在着以儒学、汉字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高度统一性,但是不同的文化地域也造就了各自迥异的文化特质。“新意识”的缘起,可以说就直接来自于这样的文化深层的呼唤。

“新意识”不仅是针对西方的抵抗,来自文化深层的呼唤,同时也是基于现实的思索。正如近代以来的越南经历了无数战争一样,被称为“越南的兰波”(Rimbaud,法国诗人)的诗人范公善(Pham Công Thiên,1941-2011)也在人生的一开始被打上了战争烙印。根据其诗集《蛇诞生之日》的记载,这一时期的诗人背对“瓦砾之山”、面对“恐怖的深渊”、脚下是一片灰烬、穷困、破坏的景象(第2页)。就此而言,战争的切身体验构成了诗人探索“新意识”的思想源点。

什么是“新意识”?野平宗弘博士提到了范公善1964年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文艺与哲学的新意识》。该书的整体内容是针对20世纪欧美文学、哲学的批评之作,在最后一章“自决的意识”之中,范公善提到“为了创造这个世界的新人类,为了创造这个世界的新意识,战争是必不可少的。战争会帮助这个世界的新的创造和这个世界的新的种族的诞生,战争会破坏乃至根绝这个世界的所有一切的价值”(第9页)。范公善在此所谓的“战争”,并不是指作为历史的越南战争,正如“自决的意识”的副标题“致尼采之信函”所提示的,战争乃是涉及到了人的存在的战争,是针对人的存在依据完全消失了的“虚无的深渊”的、人类的灵魂内部的战争。所谓“新意识”,就是在这样的灵魂的激烈决斗中来获得真正的生命,获得生命的创造的一种新意识。

归根结底,这样的“新意识”既是经历了西方冲击之下的抵抗、误读、挫折之后的觉悟,也是人类灵魂、内在生命、自我创造的觉悟,同时还是基于东亚近代历史背景下的、根植于越南人的深层意识的思想探索。应该说,范公善的诗歌创作与文学活动最为深刻地诠释了这一内涵。

二、“新意识”的真景

提到该书《新意识——越南流亡思想家范公善》的书名,令笔者恍惚之间产生了一个错觉,这是一部传记体的研究著作,会按照历史的轨迹来描述范公善这一思想家的人生体验与精神历程。但是,野平博士却是采取了思想对话式的,毋宁说哲学式的演绎方式构建起了该书的框架。

在一开始的序章,博士通过范公善自身的诗集之记载,阐述了诗人的流浪生涯,以利于我们了解诗人跨越东西方的思想背景;第一章则是以诗人如何思考越南战争为线索,重点阐释了诗人的思想的核心概念——“性”的独特内涵;第二章以“性”与“越”的术语为主轴,通过诗人60年代出版的代表作《深渊的沉默》,展开了文本的解读与剖析。针对西方的“辩证法”,博士提到范公善曾借助龙树的佛教思想而将之解释为“易化法”,并提示出“空路”这一重要概念。与此同时,博士还借助日本学者井筒俊彦(1914-1993)的语言哲学理论,就范公善的“性”的思想展开了比较性的解读;第三章则是通过范公善论述的美国“垮掉派”的代表作家亨利·米勒(Henry Miller,1891-1980)、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印度佛教思想之间的纠葛,来挖掘诗人思想

形成的轨迹与根源。最为关键的,就是范公善发现了海德格尔与米勒皆突出存在本质的共通性,并提出了作为“新意识”的“Cái(母)与 Con(子)的越南思想”(第177页);第四章侧重在了范公善的诗人这一定位,重点剖析了诗人以故乡为核心的诗歌主题;到了最后,则是通过提示“心灵”这一概念来归结现代人必须走向内心、回归自我的主题,并指出它是超越了东西方之范畴的、不管东方还是西方皆不得不面对的根本问题。

提到该书的特点,我认为首先在于一种潜在的哲学式的紧张感。野平博士并没有在一开始就阐述以范公善为中心的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冲突与心灵挫折,而是直接导入了具有符号意义的“存在”的翻译问题。不仅如此,该章的标题即“被翻译为‘性’的存在”的文脉结构之中,来自西方的“存在”(Zein)被确立为了必然的前提,作为东方传统的“性”在此反而成为了被表现之物。换句话说,“存在”的问题带有了现代性与普遍性,东方的“性”这一概念不过是过去的、如今被诗人所重新挖掘出来的一个表现而已。不仅如此,这样的紧张并没有随着第一章的结束而消失,反而进一步扩大,而且构成了绝对的对立——“深渊的沉默与高峰的呐喊”(尼采语),无论是海德格尔的“深渊”(Abyss),还是来自佛教传统的“空”,在抛开了是否需要翻译的遮掩之后,开始走到了意义争夺的决斗场。也就是说,范公善的诗歌或者文本构建起了一个意义争夺的战场。到了第三章,这样的对决演变为了直接的“对话”,尤其是带有了杀死对方这样的“冲动”或者“情绪”的对话。这样的紧张一直到了最后,即走向语言的根源之际,博士才提示出一条透明、故乡式的“调和”之路,同时也提示出“诗歌”作为沟通心灵之媒介的本质问题。

该书的第二个特点,可以说在于“诠释”。所谓“诠释”,是指该书始终站在一个多样性的话语下来阐释“新意识”。不过,野平博士与其说是为了阐述哲学的概念,倒不如说是一直在力图构建起一个哲学概念的解釋之场,通过彼此文本的互释与辨析,来逼近范公善的思想本质。对此,笔者也禁不住产生了一个印象,即该书或许并不是为了阐述范公善究竟是如何理解海德格尔、米勒,也就是西方的,而是为了演绎出一个东西方思想交融下的、探索人的存在意义的概念之场或者思想之场。因此,该书的核心精神是为了打通东西方的精神通路,追求一种文化艺术的“新意识”。这一“新意识”的诠释无疑是围绕范公善这一人物而展开的,但却并不意味着范公善就是诠释的标准或者必然的回归,倒不如说范公善的思想来源就是东方与西方、近代与反近代这样的二元对立框架的缩影,范公善的思想变迁也是尝试克服这样的二元对立框架的东方诠释本身。而且,在这样的诠释之中,野平博士最为充分地展现出了博学的知识、敏锐的洞察与深刻的问题意识,因此,这样的“新意识”的诠释应该说也是野平博士自身的哲学性思索或者说内在的精神史。

三、“新意识”的界限

正如之前所阐述的,野平博士自一开始就挑起了一个紧张的情绪,且不断地在紧张之中进行着如同杂技表演一般的诠释活动。这样的活动无疑充满了困顿、充满了艰辛,也充满了危险。这样一个紧张的诠释活动,应该说也是东西方冲突的大背景下的、东方如何接受西方这一“困境”所导致的危机。因此,我们也需要就该书的创作意图、文本分析、立场结论进行深入探讨。

首先,针对该书的创作意图或者说基本立意,我认为带有一种西方主义式的色彩。正如本文一开始所强调的,作为东方的越南,他们是否具备了自我表述的权利?就此而言,应该说野平博士代替西方的“东方学者”,发现了范公善这一人物,并进一步阐述了范公善对于以海德格尔或米勒为代表的西方现代经典的综合与演绎。不过,我认为在此存在着一个根本问题,也就是该书在针对西方原典的诠释之中缺乏了一种基于自我的反思。该书的重点放在了范公善解读下的西方经典,但却只是一种解释性的解读,——或许也会产生真正的、回归本质的怀疑吧——这样一来,也就只能

展现出一个难以超越的、语言诠释的“壁垒”。归根结底,该书的表述方式是将西方作为“先行者”或者“未来”,并以之为暗默式的前提的、西方现代性语境下的一个表述形式。

其次,通读整篇著作,笔者想要指出一点,即该书的语言事实上就是一个诗性的语言,它并没有停留在固定意义的诠释,而是带有了诗歌所具有的浪漫性与流动性。或许只有通过诗性的语言来解释诗人范公善的诗歌才是最为合适的方式吧。事实上,诗歌的创作一旦遭遇到了历史性的“大事件”,就会绽放出无与伦比的光环。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越南遭遇到了系列“战争”的大事件,由此也构成了范公善的前期记忆与“故乡”印象,并造就他成为一名诗人。不过,范公善的诗歌并没有深入到东方传统所谓的空灵境界,而是充满了青春的、战斗的激情。换言之,范公善的诗歌的浪漫性、流动性不仅与以佛教为根本的圆融心境,也与东方的触景生情、因物起兴的“诗兴”方式存在着迥异,这或许也正是东西方文化互释之中的一道“陷阱”。

第三,该书的标题——“新意识”无疑具备了双重的内涵,其一乃是直接源自范公善的文章标题;其二,则是为了介绍这一人物的诗歌之中所蕴含的新思想,尤其是针对西方经典的新诠释。第一层内涵不必赘述,第二层内涵则是留下了不少思索。正如本文一开始所阐述的,东方诸国在接受西方文明的早期,通过采取“体用逻辑”来处理东西文明迥异的问题。但是到了一战之后,西方文明的自我毁灭性开始警示东方人,面对西方的“Power”主导下的霸权观念,东方人更多地选择了“作为精神的东方”。^①这样的“作为精神的东方”的追求,或者是走向“心灵的内部”,或者是走向“东西融合”框架下的“东方回归”。^[3]这样的路径之探索,应该说也正是该书主张的作为“新意识”的“越南思想”。这样一来,博士所谓的“新意识”就具有了第三层内涵,即针对整个西方而言的“新意识”。若是将研究视角扩大到整个东亚世界的话,那么也就是带有了东亚共通的、东亚内部存在着多样性的、不同于西方且克服并包容了西方的“新意识”。

范公善的故乡是位于越南西贡(现为胡志明市)西南、湄公河流经的一个美丽小镇。自1970年借赴以色列参加国际学会、流亡海外之后,范公善就再也没有回到自己的故乡,而是一直停留在欧、美之间从事创作、教育与翻译的工作。不仅如此,正如野平博士所强调的,流亡之后的范公善几乎放弃了使用越南语来进行创作,而是采取英语、法语来进行创作(第346页),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越南思想文化的独白者与对话者。

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会陷入到“独白”的危险之中。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对话,也会陷入到“独白”的危险之中。这样的危险应该说具备了双重性,要么是采取暴力的形式压制他者,使他者屈服在自身的语境之下;要么是被他者剥夺主体自身的话语权,丧失了自我表述的权利。处在西方话语霸权冲击下的越南乃至东方,或许只有坦然面对这样的危险,才能具备实现对话的可能性。对话的根本目的,正如该书标题所示,就是要树立起一个以多样化的世界为基轴的“新意识”。

注释:

[1] 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赵京华编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73页。

[2] 高坂史朗《近代之挫折》,吴光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80页。

[3] 钱国红《走近“西洋”与“东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65-377页。

[责任编辑:司 韦]

① 日本学者井筒俊彦《意识与本质》的副标题为“探索作为精神的东方”,该书1983年由岩波书店出版。